

New Vis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华文文学新视野

《暨南学报》“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栏目论文选集

第一辑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
《暨南学报》编辑部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New Vis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华文文学新视野

《暨南学报》“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栏目论文选集

第一辑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
《暨南学报》编辑部

选编



01907084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文文学新视野:《暨南学报》“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栏目论文选集. 第1辑/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暨南学报》编辑部选编.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668 - 0693 - 2

I. ①华… II. ①中…②暨… III. ①华文文学—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①I1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8454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82 千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

定 价: 3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	饶芃子 (1)
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	
——论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其文化意义	钱超英 (8)
论美华英语文学的题材局限	李亚萍 (21)
对新马华文文学史撰写及其文学大系编纂之研究	朱文斌 (32)
美华文学中的文化意象初探	陈涵平 吴奕锜 (41)
南洋本土的汉语书写: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族性言说 ...	莫海斌 (49)
东南亚华人文学的“望”“乡”之路	王列耀 (59)
历史与叙事	
——浅谈大陆学者所撰台湾文学史的理论视野 ...	袁勇麟 (70)
论“新移民文学”中的生存焦虑与文化焦虑.....	
.....	吴奕锜 陈涵平 (81)
从《有缘千里》到《离开同方》	
——论苏伟贞的眷村小说	刘 俊 (91)
术语的暧昧: “问题意识”中的意识问题	
——论华文文学研究中常用宏大术语的适用度 ...	朱崇科 (102)
论读者参与创作小说的后现代叙述	
——以西西与卡尔维诺的想象文体为例	凌 逾 (111)
华裔美国作家笔下的历史再现	蒲若茜 (121)
接续历史的整体之思	
——叶维廉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	
.....	蒋述卓 郑焕钊 (135)
中国大陆文学期刊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	
大众化、经典化及学科化	颜 敏 (147)

2 华文文学新视野 (第一辑)

双重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对话

——以《海外华文文学读本》为中心 黄万华 (159)

走向汉语比较诗学

——关于当代海外华文文学诗性品质的思考 席建彬 (167)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关键词的阐释边界辨析

——以黎紫书短篇小说创作为例 彭 程 (178)

文艺副刊与马华地志散文之兴起 林春美 (188)

“异”审美视野中的香港文学 黄 一 (201)

叶维廉与现代主义 闫月珍 (213)

超越自我与他者的表述

——李恩富和容闳自传中的中国形象及其反映的

身份观 詹 乔 (226)

海外华文文学：学科之名与学理之弦 杨匡汉 (235)

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

饶芃子

【摘 要】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海外华文作家都是在双重文化背景中写作，他们的作品中常常有两种文化的“对话”，需要以跨文化的眼光去对其审视和观照。为了探究海外华文文学丰富多彩的文化和美学的价值，应当引进比较文学的多维比较方法。在海外华文作家笔下，有一些不同族群的人物形象，这是一种文化的现实描述，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解读和诠释，对其进行分析、追问，会给海外华文文学提供新的理论研究空间。

【关键词】海外华文文学；跨文化；多维比较

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但由于这两个学科的对象都是跨国别、地区的，都具有世界性、开放性的特点，因而有许多交叉和可以相互跨越的学术视点，如若有意识地让这两个学科相接轨，既有助于拓展比较文学的学术领域，又能在某种程度上深化和扩大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成果。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比较文学的高层学术研讨会上，已陆续出现了一些这两个学科交叉的学术论文。1993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讨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间的关系”问题时，不少学者认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对待两种文化接触的态度，两种文化可以是不同国家的文化，也可以是一个国家内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而对后者进行的探讨中，就涉及海外华文文学在各居住国的边缘状态，以及其是否被所在国主流文化所接受的问题。与会者还就美国华文文学处境问题展开讨论。1996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肖红教授等五位学者向大会提交了这个方面的论文，大会学术组还专门安排了一段时间研讨海外

华人作家的写作问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在大会的总结发言中特别指出：“海外华文文学是比较文学即将要去拓展的领域。”1999年8月，在四川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大会学术组把“异质文化背景下的华人文学”作为研讨会的重要命题之一，并且收到了12篇这方面的学术论文。由于论题新颖，讨论十分热烈，成为研讨会的一个学术热点。此外，自1991年以来，全国性刊物《中国比较文学》还开设了“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专栏，专门刊登和介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从上述这些情况看，海外华人文学（包括海外华文文学和海外华人用其他语种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已被比较文学界所接受，并且把它作为一个新的正待拓展的领域在推动。

相对而言，在如何把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引进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方面，人们关注较少。本文提出和要讨论的问题是：把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投射于海外华文文学这个特殊的空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可能产生或出现哪些深化和更新。

我国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二十年来，我们经历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对海外华文文学和华人文学“空间”的界定，对海外华文文学历史状态和区域性特色的探索，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关系探源，海外华文文学地区史、国别史、理论批评史的撰写等，已经有了丰硕的成果。近几年，已有学者在进行海内外华文文学的整体研究，还出现了海外华文文学诗学层面的论文和著作。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正在不断扩展和深入。但是，在这世纪之交，我们如何加速研究的步伐，对这个非常特殊的汉语文学书写空间及它所蕴含的内在的丰富性作更深的挖掘和多样性的展示，就有一个进一步拓展视野和更新观念、方法的问题。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跨界限的文学研究，世纪视野、开放意识、跨文化、跨国别、跨学科的研究是它的最主要的特征。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在未来世纪，如能借鉴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将会促使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现象的生成和深化，得到更多方面的理论诠释。

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实际出发，引进、借鉴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之所以是可能和可行的，是因为海外华文文学作家都是在双重文化背景中写作的，他们的作品中常常有两种文化的“对话”，极需要以跨文化的眼光去对其审视和观照。海外华文作家在本土以外从事汉语写作，他们是处在居住国主流文化的“他者”，面对两种文化的接触，既有一个自身群体文化归属的问题，也希冀能建立同主流文化交流的平等对话模式，但

这在现实生活中的主流与非主流文化沟通中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在权力结构中,主流文化的话语权远远超过了非主流文化的话语权。这就使处于非主流文化的“他者”要自找出路:一是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边缘状态求生存;二是与主流文化认同,通过各种方式去化解、协调与主流文化的各种矛盾、冲突;三是相互兼容、互识互补,这往往是在一些文化差异不大的国家和地区才可能达到。但无论处于何种状态,都有一个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影响和融合的问题,而这些就会以各种形式反映在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并非是以本土的单一文化的眼光所能深刻理解的。由于海外华文作家所在国国情不同,作家个人的文化身份不同,他们的文化生存状态和对文化所采取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因而在文学中对两种文化的隔阂、碰撞及其生存状态的感觉和表现就个个有别。为了把握这一研究领域的更具特色的问题,比较文学的多维度比较方法,应是我们进行研究极为重要的方法。

海外华文文学的根是中华文化。生活在西方的华文作家,因为原先的母体文化同所在地区、国家的客体文化相差较大,而且西方社会主流文化总是居高临下“俯视”东方,加上有种族方面的歧视,使主流文化很难同客体文化平等对话或完全认同,他们不得不承受许许多多的压力,在他们的作品里,充满“放逐”的酸涩和文化疏离的痛苦,既有个人生活的浪子悲歌式的抒写,也有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思考和在文化上平等对话的追求。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主要接受西方教育的华人作家,或者是在国外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人,有可能完全倾向于西方的文化立场,他们对本民族文化只是作为一种纯然的个人和历史的记忆来书写。在东南亚地区,由于华人移居较早,数量多,文化交流频繁,而且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兼之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过去曾存在于殖民体系的掠夺之中,不像西方世界那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华文作家在这些地区生活和创作,虽不无文化疏离和阻隔,但经过不断调整,还是能走上两种文化相互兼容、互识互补的道路。这就自然形成了不同地区、国家华文文学的不同特色。

海外华文作家移居海外,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在他们的背后,隐藏着政治、历史、种族、文化、经济之间的无数纠葛,其作品便承担着各种关系的交织。所以,在这个特殊的华文文学空间里,充满着异域感、流亡、放逐、陌生和对故土的回忆。他们在异国他乡坚持用汉语写作,实际上是一种生存意志的体现,是在异质文化环境里为消除陌生感、不安全感而努力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是对本民族文化理想的诉求。美国著名华文作家聂华苓就曾说过:“汉语就是我的家。”瑞士华文作家赵淑侠、泰国华文作

家司马攻、新加坡诗人陈松沾，都曾在他们的文章中表达对母体文化的这种深切感受。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不断相遇那些跳荡的、寻找着的心灵，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边缘与中心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心灵的呼应千姿百态，思想更是一条条方向各异的小路，伸向幽昧或明亮的地带。文学以其特有的形态，给人们留下了各种各样细微、深邃的心灵感触，使我们从中感受到文化的归属和认同对于那些生活在家园以外的人意味着什么。

为了探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及其意义，展示其丰富多样的文化和美学价值，显现域外特性，我们可以在研究中引进比较文学多维比较的方法，既将其与中国本土文学相比较，研究其传播、影响和在各个不同国家、地区延伸、发展的状态，探索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脉络，以及与不同民族文化接触、变异和被认同的程度；也可以将中国本土以外各个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相比较，研究不同国别、地区华文文学作品中的美学模式、风格、文学语言的衍变史，研究它们如何在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这种蜕变；还可以将一个国家、地区不同时期、性别或同一个时期的不同华人作家群体进行比较，探索他们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创作状况，特别是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碰撞，或同其他非主流文化的接触中，对本民族文化所采取的态度，以及所作出的文学反映与选择，寻求其异同。通过这种多维的比较，从总体上更深、更广地认识、把握这一特殊空间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把这些植根于海外生活经验的文学转化为一种域外汉语诗学，进一步去促进其未来的发展。

在海外华文文学的想象空间，有许多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和融合的印记，对文学想象中不同民族文化影响的研究，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尚未“开封”而具有深远文化意义的命题。在阅读、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海外华文作家笔下，也塑造了一些所在国不同族群的人物形象，如黑人、白人，泰人、菲律宾人、马来人、印度人等，还有华族与其他族群的混血儿。从这些人物形象中，我们接触到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作品如何构造异族艺术形象的问题。分析、追寻、研究这些文学中的文化现象，从中可以看到华族文化与异族文化相遇时的各种不同状态，也有助于了解作家在两种文化接触时所采取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文化“对话”的依据，给海外华文文学提供新的理论研究空间。

研究“一国文学中所塑造或描述的‘异国’形象”^[1]是法国比较文学的奠基者之一让—马丽·卡雷提出来的。他认为，对不同国家文学的关

注,“要有文化中的异国层面的对话”,应重视“民族间的相互看法”、“想象间的相互诠释”。^[1]卡雷的主张,推动了文学作品中异国形象的研究,把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从一般的“形象”研究中凸现出来,人们开始注意:文学怎样以变化多端的形式表现异国、异族,塑造不同于本民族的“他者”形象。近年,形象学在国外,特别是在欧洲大陆发展迅速,已引人瞩目。笔者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引导下关注到海外华文文学中的这个命题。

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处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一意识有时并不那么强烈。他们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是根据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想象,是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当中凝结着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对于作家笔下的“他者”形象而言,也是一种说明符指关系的描述。这些形象虽来自异族,但他们是经过华文作家的文化眼光和文化心理选择、过滤、“内化”而成的,是作家从一定的文化立场出发,根据自己对异族文化的感受和理解,创造出来的不同于本民族的“他者”形象,已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他”和“她”,而是他们在华族文化中的“镜像”和“折射”,是在两种文化“对话”中生成的,可视为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解读和诠释。所以在对这些形象进行分析时,追问的重点不在于他们是否忠实于生活中的原型,而是在于这种描述、表达显示出作家所向往的是一个怎样的虚构空间,作家怎样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他者”和“他者”文化,通过他们提出和表现了哪种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范式,这种想象和描述在多大程度上、出于何种原因而产生了什么样的文化偏离和美学效果。

以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一些“他者”形象为例。我们认为,他们基本上是分属于三种不同的类型:

一是按本民族的需求塑造“他者”形象,着重表现“他者”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是一种集体化、理想化的文化诠释,其效果是强化了本民族的文化。菲律宾女作家黄梅的小说《齐人老康》,女主人公玛丽娅是菲律宾人,跟当雇员的华人老康已生活了二十几年。因为老康来菲之前在中国老家已有妻子,她虽然已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可一直没有名分。但她并不计较,仍不辞劳苦地操持家务,养育儿女,渡过许多难关。老康的华人亲友对她都公论:“要不是玛丽娅跟他艰苦持家,他还能有今天这样一个还算过得去的局面吗?”从作品中玛丽娅的思想和行为看,她对华人的生活习俗是很认同和融入的,是一个已经“华化”了的“他者”。作者借老康的亲友之口赞扬她,实际上是言说了“自我”,肯定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新加坡女作家孙爱玲在小说《绿绿杨柳风》中塑造了一个印尼人韩逸文。他是一位年轻的大学教授，虽然在西方接受高等教育，但很认同中华文化，而且深深地爱上了年轻的华人寡妇秦勤。他们的文化背景不一样，却能彼此理解并互相接受。由于他们各自有过婚姻，因而遗留下种种问题，最终未能结合。这个没有结果的异族相爱的故事，既朴实又动人，作者在描述时不带有民族偏见，表现的是一种族群的文化理想。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泰国作家红缨笔下的泰人坤专（《幸福的罪痕》）、李栩笔下的印度人印闾（《漠漠的印闾》）等。

二是质疑现实的“他者”形象，反映出现实与理想有距离，对本民族的某些保守意识和偏见有“颠覆”作用，表现出来的是文化思想的开放状态。菲律宾女作家范鸣英的《同是等待》和佩琼的《油纸伞》，女主人公分别是菲律宾人马蒂丽丝和中菲混血儿李珍妮。由于她们是老一辈华人心目中的“番仔婆”和“出世仔”^①，一个是婚姻受阻，一个是不得不放弃自己之所爱。这两个作品的作者都具有文化的“自省”精神，她们在作品中通过两个母亲无理地拒绝“他者”，批判了传统文化中那种狭隘、排外的民族观念。

三是表现文化相异性的“他者”形象，用本民族的话语，对各种相异性作出自己的诠释，同时也进行“自我”的审视和反思。新加坡女作家尤今的小说《织布匠》，写的是印度姑娘茵娣娜“相亲”和结婚的故事。美丽的茵娣娜受过高等教育，已经有了相当理想的工作，但观念保守，东方古老的民族传统在她心中根深蒂固。尽管她向往自由，但是没有勇气去争取，最后任家里人摆布，嫁给一个有钱人，把忧郁变成食欲，生了五个孩子。从此，美丽、迷人的茵娣娜一去不返了。这是一个发生在现代社会的古老故事，一个由保守的民族文化酿成的当代人的悲剧。作者在作品末尾，通过“我”和茵娣娜久别之后在新德里“重逢”，创造了令人震惊、心痛的悲剧效果。这个故事表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也有作者对某种保守的民族文化范式的批判。已故泰华女作家年腊梅的小说《我的上司宇文坦先生》中，主人公宇文坦是一个中緬混血儿、经济学专家，在一个跨国公司任高职，工资丰厚，公司还配给他洋房、轿车。但他笃信佛教，长期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处处自律。作者在作品里刻画了这样一个“他者”，既有文化反差的描述，也有两种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这应是两种文化相遇时人们所追求的理想模式。马来西亚女作家李忆君的小说《风

^① 中菲混血儿被称为“出世仔”。

华正茂花亭亭》，写的是北印度女子妈妮同华人周承安的爱情、婚姻悲剧。他们年轻时能冲破文化障碍，相爱结婚，但在家庭生活中，妈妮所受的西化教育和所处的高层社会背景，使她常常有意无意地“俯视”周承安，而周承安内心深处那种华族的“妇道”观念，也使他难以接受妈妮的思想行动，最后导致婚姻破裂。这个悲剧故事的酿成，不无妈妮的性格因素，但也有两种不同文化的撞击和阻隔。此外，还有新加坡华文作家姚紫笔下的荷兰人兰娜（《窝浪拉坦克》）、女作家陈华淑笔下的白人麦先生（《麦先生的爱情》）等。

以上三类只是尝试性的区分，应当指出的是，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这三种类型并非互不相关，有时还是相互包含的。而且这种分类主要是在文化层面上展示“他者”形象的虚构意义，并未对他们作出艺术上的具体分析。如若从艺术的层面切入，这些作家笔下的“他者”形象也是个有别的。

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中，形象学的研究还是一个新的领域，本文将其运用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旨在探索新的理论思路，为这个学术领域提供一个文化与文学研究结合的新视点，从而挑战旧的理论模式。

【参考文献】

- [1] [法] 让-马丽·卡雷.《比较文学》前言 [A]. 陈淳, 孙景尧, 谢天振. 比较文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164 ~ 165.

(原刊于《暨南学报》2000年第1期)

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

——论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其文化意义

钱超英

【摘要】身份（认同）是海外华人文学的主要关切问题。新近兴起的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以其身份焦虑的表达，提供了观察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海外华人文化及文学变化的一个例证。这种文学反映的自我身份疑难，涉及对中国、对其他华人移民和对西方等多种不同对象的“自我—他者”建构，从而形成了新一代华人文学文化意义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同时也提示了对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从整体化、同质性的理解方式向对象细分的、动态的和文化的理解方式转变的必要性。

【关键词】海外华人文学；新华人文学；澳大利亚；身份（认同）

—

对“身份”（我国文献有时译为“认同”）的关切，是海外华人文学存在的主要支柱，因而也是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中心议题。

作为一个从个体心理学引入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身份”的原意“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1]。根据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的文化研究学者 Paul Gilroy 的观察，随着“身份政治”的兴起，“作为一个概念，‘身份’已被置于一系列急迫的理论论争和政治问题的核心地位”。就这个概念的含义，他论证道，身份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由环境所激发的认识和被认识所促动而表达在一定环境中的互动过程。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析工具，“身份”这个概念是“一种在我们对世界的主体性的经验与这种微妙的主体性由已构成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方式”^[2]。

因此，“身份”尤其便于用来考察那些在明显不同的“文化历史设定”的裂缝之间漂移运动的“主体”——移民、亚文化成员、边缘群体、在全

全球化中经历急剧社会转型的民族——所必然面临的生活重建经验。人们从原居国移民到另一个国家，或者从乡村迁往城市，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所面对的不仅是居住环境、工作、用品和食物的变化等实际问题，而且是关于“我是什么，而不是什么”、“我曾经是谁，现在是谁”、“我为什么如此生活”的问难。他需要有一种令其满意的、完整一致的意义解释，以便于接受和平衡转变所带来的心理风险，使自我和变化着的环境的有效联系得以重建，以免于主体存在感的失落。

本文把“身份”理解为人和他所生存的世界作为文化环境（即“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的被意识到的联系，利用这种联系，他得以作出关于其生活意义的解释。而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不确定性，即人及其生活的世界联系的、被意识到的障碍和有关生活意义解释的困难与危机，以及随之产生的观念、行为和心理的冲突体验。

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的论述，在“晚期现代性”中，“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充满了“风险”和“机会”，现代生活和个体决策所经历的“转换的每一个片段都倾向于变成一种认同危机（An Identity Crisis）”。这种危机常常伴随焦虑：“由于与客体世界的建构性的特征相关的自我觉知变得模糊不清，正在发展的焦虑会威胁自我认同的觉知”，而“焦虑是所有形式危险的天然相关物。其成因包括困窘的环境或其威胁，但它也有助于建立适应性的反应和新的创新精神”。^[3]

全球问题的普遍化在不可阻挡地把第三世界的民族生活吸纳其中的同时，也使其直接投身海外生活的成员不可避免地面临更为直接的身份焦虑。

本文所说的“新华人文学”，是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赴澳大利亚的、为数约五万的中国大陆华人移民群体中涌现出来的文学。“新华人”（The New Chinese）是一个始见于近年英语文献的新指称，以区别于一度盛行的“中国学生”（留学生）概念。^[4]这种称谓上的转变，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区别于来自世界上其他国家留学生的特殊身份和跨文化历程——从留学生到国际移民的历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区别于传统华人移民和当代非大陆地区（如港澳台和东南亚）的华人移民的崭新特性。

历史上华人到达澳大利亚的确切记载始于19世纪，今天这个国家已成为华人移民到南半球的最大的目的国。在该国业已累积的大约40万华语人口中，新华人并不占多数，但是由于他们集中在1989年前后一段极短的时间内大量涌入该国，给予这个总人口只有1800万并由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文化主导的社会以很大的震动。它的“中国学生问题”成了整个西方世

界同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政治和多元文化的焦点议题之一。这一“问题”，经过前后长达近十年的艰苦抗争，在 20 世纪结束前夕才得以解决：新华人从总体上结束了非法状态，成为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多种族居民的一个群体。对澳大利亚来说，这是华人自“淘金时代”以来最大的一波移民潮。

虽然文学活动在新华人的澳大利亚经验中只是一个非常有限的领域，但是，它仍然充当了他们在这个社会存在的重要的身份标识，正如大量的投资、生意上的技能和经济领域的成功是其他背景的华人移民在西方社会存在的重要标识一样。1997 年 8 月，悉尼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梅布尔·李（Mabel Lee）向在比利时雷登大学召开的第 15 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大会提交了一篇原题为《崛起的声音——澳大利亚华人文学》的论文，她注意到：和这批中国大陆人相比，香港和台湾的新来者中“并没有如此高度集中的学术性、新闻性和想象性的作者”^[5]。其他统计也显示，由新华人兴办的报刊杂志上，与想象创造有关的文艺内容所占的比例，比那些针对其他华人群体的要高得多。^[6]澳大利亚主流英语研究界正在积极地翻译和研究新华人的文学作品。至于我国大陆，如果从 1991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算起，迄今已有大约 20 家出版社出版过他的作品的单行本或选集。

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的涌现，其实只是在同一时期出现在其他西方国家的普遍情况的一个例证而已。因此，本文对它的若干观察，有可能为认识全球范围内华人文学的新近变化及其文化意义提供某种方法上的尝试。

二

一些对新一代海外华人文学的较早观察，已经显示了它具有远较传统的或当代其他的华人文化更强烈的冲突不安的特质。杨炼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海外诗歌旅程中，已经面对海外读者和听众对其作品的“惊惧”和“惶惑”：“这位中国诗人，是否天性就像一只食肉鸟，嗜好痛苦与罪恶？”^[7]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的一位较早的评论者张威（微风）博士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发现，他在悉尼收集到的小说作品除了很少篇章闪现出一些生活的“亮色”以外——

哀愁、悲伤、残酷、无望、绝望、疯狂、荒谬，几乎融汇在所有的作

品之中。你说这是人们对中国留澳学生的反映也成，你说这是当今世界的缩影也成，反正这是一个问题。（世界走到末日了吗？）问题既然提出来了，就肯定会有人去解答。只是时间早晚罢了。^[8]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新华人文学就总体而言，是新华人在一定的海外环境中面对的身份问题在“想象—表意”领域的反映。这种“想象—表意”过程始终伴随着严重的身份焦虑——即无法在一个发生着深刻变化的环境中整合关于“我（们）是谁”的各种矛盾的解释，因而无法为身份找到意义上的确切定位。关于这一点，一本出现在墨尔本、由诗人欧阳昱主编的纯文学杂志《原乡》以如下对话，显示了一种严峻的自我审视：

问：你觉得他们（来到澳大利亚的中国大陆人）还是中国人吗？

答：他们很难定性，他们既非中国人，亦非澳大利亚人，他们是一种真空人，一种夹缝人，一种哪儿都不属于，一种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人，一种澳中两国都可以收归国有又可以弃之如敝履的人，一种类似奸细的人，一种没有归属感、被历史挂起来的人，一种为哪方做事都有叛徒的感觉，难以忠心耿耿的人，一种骂别人是种族主义者，自己也是种族主义者的人，一种连自己同种同族的人都无法容忍的人。

问：你觉得他们还有救吗？

答：没有。他们以为钱和性是他们的救星，其实那不是的。他们以为一个强大起来的中国会是他们的救星，那也不是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救他们。

问：也许文学会吧？

答：我不知道。^[9]

这段对话不仅是对新华人生活中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指证，如中澳关系、经济奋斗（“钱”）和欲望的解放与困扰（“性”）等，而且包含了新华人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基本评价：这是一种充满了“机会主义”的色彩、想左右逢源又进退失据、没有可靠立足点和精神向导的人生——一种连自己都“无法容忍”的人生。由于这种无从拯救的发现，人们需要以“文学”来求取未经证实的“得救”。

这部分地解释了新华人文学骤然涌现的原因：这个群体大面积的知识分子背景，除了为海外华人社区带来了比以前更为丰富活跃的“象征资源”以外，也带来了由 20 世纪末期的跨文化经历所孕育的、需要借助文

学想象来宣泄的巨大内心压力；正是在身份出了问题的地方，身份的重建才成为如此窘迫的问题。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海外华人没有身份焦虑。虽然由于其以“劳工—商贩”为主的阶层背景的限制，他们的“象征资源”不如当代新华人那么丰富。其实，当代新华人在西方社会生活中总体的边缘化处境，和传统华人移民的经验具有深刻的历史连续性。然而，新华人在当代条件下赖以调整和重建其身份的那些因素，又往往表现得更为复杂。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从考察他们身份建构中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入手。“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要求有另一种不同的和竞争性的 alter ego（改动的自我）”^[10]，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华人移民作为族群在海外找寻自我和群体存在意义的策略。

然而，仅仅着眼于从中国生活到西方社会的文化适应这一维度，并不能有效地清理华人文学所象征的海外华人文学新近变化的全部文化意味。事实上，新华人文化的复杂性在于：其身份建构所需的“他者”参照绝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对象。这使得他们的身份探索成为多种矛盾关系堆叠之下的难以调解的困扰。

三

观察和分析表明，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的身份问题至少和三种对象的“他者化”过程有关。

第一，海外新华人多数成员的身份问题首先来源于中国社会这个参照对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留学生”名义骤然涌入澳大利亚的新华人，构成了这个西方国家自19世纪“淘金潮”以来最大的一波华人移民潮。一项有关其在中国的阶层和职业背景的调查表明了他们大部分属于拥有学士或以上学历的教师、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即一个知识分子集团。^[11]他们在中国时主要活跃于一个知识阶层尚未深度介入变动中的经济结构，且和国家主流权力架构处于某种张力关系的阶段。作为一个激变时代的文化符号传播者和理想者，他们以“走向世界”的当代先驱自许，首先就需要通过把中国作为一个“异己的”对象加以“他者化”，以标识、建构自己对一个“前现代性”社会的叛逆身份，支配20世纪八九